

发展论坛

保障改善民生
提高共享水平

热点聚焦

新常态对改革开放的新要求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以“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重要标准,紧紧围绕补齐民生短板,采取切实措施狠抓落实,一幅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民生画卷”灿然展出。

努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截至2015年10月,全国31个省区均出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方案。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逐步推进,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教育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投入资金1100多亿元,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和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颁布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编制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2015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全面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的目标,全国新登记企业443.9万户,同比增长21.6%。

积极完善健全社会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动实施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助并轨,努力消除居民身份、地域差别,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社会保障基础进一步夯实。

此外,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是国家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既有利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又有利于提升人口素质。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近两年居民收入增速跑赢了GDP增速。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更为难得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

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程。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有长期抓、坚持做的决心,要主动作为、主动担当,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接力奋斗、持续努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过上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切实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守住底线。由于每个人禀赋不同、能力有异,业绩有优劣、机遇有差异,因而获得的报酬和生活水平是有差别的,但社会应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守住底线就是要保基本、托住底,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托住普遍的基本保障的底。要在医疗、养老、义务教育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满足人们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二是托住特殊困难人群的底,对特定人群进行特殊救助和扶持,守住他们生活的底线;三是托住急需救助人群的底,帮他们渡过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各种难关。另外,还要保证社会保障的标准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相适应,过高的福利水平会超出现有的国家供给能力,危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突出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突出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想困难群众,多想想贫困地区,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叠花的虚功。一方面要突出重点人群。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关爱、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精准扶贫,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们民生方面最大的短板即贫困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要突出重点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主战场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各项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倾斜,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新兴产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向贫困地区安排,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转移;帮扶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帮扶手段既要有直接的经济手段,更要有长远的教育等手段。全面小康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建共享的小康,“一个都不能少”“决不让一个地区掉队”。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一项任务。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

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完善制度。“完善制度”,就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建设要注重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地区差异大、制度碎片化问题。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制度。

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引导预期。引导预期的思路,就是要使民生改善既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府主要是保基本,不要作过多过高的承诺,多做雪中送炭的重点民生工作,引导和鼓励广大群众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政府不能包打天下。这是因为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价值追求和职责所在,但不是说党和国家就要大包大揽。“如屋漏者要在宇下”,政府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幸福不会从天而降,要引导人们通过辛勤劳动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一勤天下无难事”,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进行宣传,要让全体人民都意识到,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执笔:沈传亮)

本刊主编 马志刚

责任编辑 裴珍珍 欧阳优

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编者按 “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处在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新一轮经贸规则构造期,中国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何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如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如何促进创新、绿色发展、产业升级?如何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如何提高参与全球治理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本文进行了深入阐述。

支撑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阶段中国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从当前的发展阶段出发,根据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升级的现实条件和目标来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设计,明确要求在2020年之前建成基于现阶段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支撑二:开放的新格局。首先,空间上的格局提到的是双向开放,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因为我们早期的开放比较偏向对发达市场的开放,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涵盖65个国家,其更加重视对周边国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开放。在空间布局上,沿海、内陆、沿江将承担不同的任务。对沿海地区来说,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能够引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继续创新,也就是所谓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沿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是我们落实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建设国家大通道的一个重要考虑。目前,不少地方陆续提出了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案。例如,西安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甘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宁夏建设内部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在“十三五”期间要谋划一些可操作的举措,既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开放,还要做好承接东部地区一些产业的转移;另外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这个大格局是空间布局的关键点。

其次,产业格局方面。过去30多年把制造业的开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开放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使得中国一跃成为货物出口的第一大国,但是这些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在中国的增值环节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价值的。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开放竞争就是在国内公平的竞争环境下,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有国际竞争,所以贸易保护程度也应该有所降低。当然,这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要在明确战略的情况下逐渐降低保护程度,逐渐引入竞争,尽快推动在技术、品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开放不足的领域是服务领域。服务业的部门一共有160个。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100个,其中29个没有附加条件,剩下的附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例如地域限制、股权限制等。但实际上,国内的服务是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需要的。比如教育中的择校难,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够,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改革,一是靠国内本身的改革,例如促进教育均衡,公立医院的改革等等;二是要开放,开放才能促改革,通过开放引入新的服务业态、新的服务理念,甚至把一些高端的服务资源吸引过来。所以,服务领域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

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通过开放来促进国内的改革、促进国内的创新、促进中国整个产业,特别是那些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如果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把不同的产业进行分类,会发现资源类的产业、农业、服务业,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等竞争力比较弱。但尚存在一些企业,比如中石油经过改革以后,可以变成全球很有国际竞争力的石油公司。当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受到挑战的时候,要想办法在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提高国际竞争力。未来的5年规划要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形成开放的新格局。构建开放新格局本身也是新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目标就是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要从以往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调整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从八大战略重点着力:加速推进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改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积极推进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其实就是要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但对每个国家来说却可能是挑战,它是把双刃剑。如果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产业就可以加速升级;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就可能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落伍,被边缘化。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在这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制高点,都相应地制定了国家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与德国工业4.0强调的“硬”制造不同;美国版的工业4.0实际上就是“工业互联网”。日本、英国都有类似的发展战略。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名单,各国也是大同小异。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日本、韩国还把文化产业列在里面。

对中国来说,抢抓本轮产业革命机遇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传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比如汽车产业,想真正追上德国、日本的水平确实不容易。其实全球的汽车产业大格局现在已经比较稳定,再产生新的汽车产业大集团不容易,但因为这轮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机会,电池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现了特斯拉这样的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所以,如果我们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结合得好,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就可能使传统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当然走的不是原来那个技术路径,但这条新路径应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从全球来看,全球的经济治理是处在一个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定的全球秩序持续了70年,总体上保障了世

界的和平与繁荣。时至今日,这个秩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代表性不足。就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这个大格局中地位大幅度上升,但是它的利益、它的投票权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中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第二,公平性不够,这一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比较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来说体现得不够;第三,当前的经济治理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新要求;第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乏力,暴露出不足和缺陷,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共识,一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期,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博弈不断加剧。一方面,各国力争加强在现有国际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主要国家不断提出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与规则,比如G20正在为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合作像雨后春笋一样,现在已经运行的区域合作组织有200多个,反映各国希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争取领先不愿落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推进进一步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另外一方面一些大国又刻意推动新一轮规则的制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希望少一点限制,多些便利,这也将为中国企业在全全球布局中创造条件。

区域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的,只有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非成员不能享受开放的成果;还有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比如APEC通过谈判降低关税,非成员同样可以享受,是不排它的,不歧视非成员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央提出要实施自贸区战略。截至目前,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已经大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等。今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中国要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一,我们要着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要在保持现有全球规则、全球治理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渐改革、完善相关规则,提升其公平性和代表性。

第二,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要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放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个大格局下来看待。国际组织的规则可以是多边的,也可以是区域层面的。在新一轮开放过程中,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开展这种制度性安排;另外一方面也要重视开放的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体现。

第三,我们要主动提出一些战略倡议,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全球战略,这是国家软实力体现。一直以来,我们对全球治理的改革较少提出建设性倡议。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新问题,需要新的治理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刘德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特殊本质和运行规律,致力于升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系统经济学说。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符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中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前进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始终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体制机制,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遵循人类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规律。

发展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自然问题、社会问题。仅从经济领域看经

济、抓经济,发展就容易走向偏颇,难以保持协调和持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将三个规律并列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和核心内容,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既蕴含了经济规律的丰富内涵,又体现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发展要求,是把握和遵循这三个规律及其内在统一性的结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是我们党认识规律、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应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双向互动、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伴随着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逐步深入,我们党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形成了高度凝练的思想成果、理论成果和经验总

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创造性发展,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更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学理支撑。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